

发展：时代的中心

——“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纪要

由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烟台第二汽车运输公司等十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于1992年8月13日至17日在烟台市举行。来自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其它学科的6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围绕着有关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交谈与讨论。现将会议讨论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与观点归纳如下：

一、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与现代社会发展观

有代表指出，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有如下特点：第一，理性先定论。社会发展的根据和尺度是理性预先决定的，理性是外在于人、先于人而存在的永恒原则。第二，本体还原论。理性作为先天的力量是一切存在的本体属性，依据理性的发展是一种向本体复归的过程，发展的方向是越来越接近和符合本体自身的规定。第三，单一模式论。从理性出发，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既定的，单一的，无可选择的。第四，世界至善论。从理性出发，社会发展向越来越符合理性的趋势前进，人类社会也随之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野蛮到文明，由自然状态到契约状态，由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最终达到至善至美的终极境界。第五，自我中心论。理性主义从理性原则出发，判定人对自然的先天优越性，认为人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是自然界的主宰，只有发现并完善理性，人就能无往而不胜。

这些代表进一步指出：面对21世纪的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大力破除传统理性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代之以体现20世纪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第一，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先定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我决定论。严格意义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主动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不是先定的力量，而是实现目的活动本身。只有人能自己提出目的，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之实现，导致自身相对于目的而言的进步。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超越。第二，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还原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创造使人类社会越来越远离自然，人就不得不告别对自然的依赖，转而求诸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提高。20世纪人类实践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工业时代以前，体力劳动是实践的主体。人越是依赖体力劳动、依赖自然，发展程度就越低。进入20世纪，脑力劳动逐渐与体力劳动平分秋色，甚至在创造产值、影响社会方面大大超过了体力劳动。到目前，科学技术已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脑力劳动、高信息高科技的活动已成为社会实践的主要推动力量。这说明精神活动在人的实践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人的创造能力大大增强。第三，破除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20世纪社会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第四，破除社会发展的世界至善论和人类自我中心论，恢复马克思的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人类必须从自我迷信中觉醒，代之以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走有节制的、自主的、多

样性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这就是面向21世纪的社会发展意识,也是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历史使命。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特征

有代表认为,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本来是一个历史递进的过程,然而对于20世纪后期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说来,这种历史递进的文化形态却变成了共时共存的,这也可以说是世界一体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特殊历史环境。而这种环境背景的改变又客观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是独特的,它不可能完全重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这一角度说,中国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看,每一种文化的发展本质上都是富有个性和特殊性的。过去我们往往用二种机械决定论观点考察文化。然而实际上文化是一个综合有机体,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渗透、协同和整合的总体过程,某一部分的差异都有可能导导致文化发展样式的差异,而且各种文化因素的作用也是经常转换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化作历时性研究的同时,更要重视和加强对文化综合体的共时性研究,以便弄清文化整体结构和系统内部的有机状态。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了,任何一种文化类型——哪怕是最先进、最强大的文化类型都无法最终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它文化头上,它们可以毁坏和扭曲落后文化或邻近文化,但往往很难使这些文化丧失其个性。

有代表指出,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和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和认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应当以目前已经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目标的一元性(取决于示范效应的理性方面的规定)与实现目标的途径的多样性(由零和博弈决定的价值方面的选择)相统一的结构为坐标,使理性(非超越方面)与价值(超越方面)相互规约和限制。作为总体性概念,发展和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文化系统的格式塔转换。这不仅与社会的系统性质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代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都已被整合到世界体系之中,具有全球性特点。因此,这种格式塔转换带有新的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古今中外文化及其演化特点在此种状态下的同时呈现(对西方文化来说是历时性的进化序列,对中国文化来说则是共时态结构的呈现),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全部冲突的根源之所在,也是扬弃种种对立的契机。它使得中国现代化不必重复西方文化的近代、现代、后现代等不同时间维度,从而为我们在共时态意义上对他们作了选择,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提供了可能性。今天,当人们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放在优先地位来加以发展时,就应该通过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历史异化得到借鉴,以自觉反省和预先限制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当人们在现代化目标孜孜以求,而对传统文化在总体上持一种批判态度的时候,也不应忘记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矫正和更深层的补偿。总之,当今时代已不允许我们沿用西方近、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曾使用过的那种单向度的线性的两极互斥的思维方式,而应确立一种多元互补、有机整合的新思路。

三、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阻力问题

代表们普遍认为,“左”的观念与行为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主要的阻力。改革开放的十几年历史已充分说明,每当“左”的东西盛兴起来,便意味着改革开放进程受挫。不彻

底清除“左”的东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前途。

有代表指出，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是来自“左”的方面，有时还来自民众自身。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众已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改革与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势。除了改革与发展，中国别无选择。中国每个社会成员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与改革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着改革深入而广泛的推进，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中国改革与发展所遇到的阻力也往往带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群体性。换句话说，广大民众（尤其是城市社区的民众）在普遍要求改革的同时，客观上也形成了不少违背改革本意、逆改革大势而行的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往往是跨区域、跨阶层、跨代际的。这是中国社会在特定时期所存在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二难现象。造成这种群体阻力的原因是：1. 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2. 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社会焦虑现象；3. 一些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稳定问题的误解。改革的群体性阻力对于中国整个发展进程会产生一些明显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展过程的推动力量；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成大量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在特定的时期之内，随着改革深度及广度的增大，改革的群体性阻力也有可能随着增大，从而很不利于改革与发展过程的顺利推进。我们应当做的，是尽力多作一些缓解性的工作，将改革的群体性阻力所产生的负作用降至最低限度。而缓解工作又应遵循这样两个原则：一是缓解工作应当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正常进行，决不能以牺牲改革与发展为代价。否则，便会在客观上助长了改革的群体性阻力，助长了改革过程中十足的反向力量亦即“左”的倾向；二是应当全力防止改革的群体性阻力的膨胀。否则，得以膨胀的群体性阻力一旦同改革过程中的其它不利因素结合起来，便很容易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

四、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

有代表指出，所谓开放，就是适应在多元相关中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历史阶段，解除以往自我封闭状态，极大地加强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交往，使自身呈一种良性的、最有利于发展的开放系统状态；而所谓改革，就是适应新的世界历史阶段，解除以往对于社会主义的僵硬限定，而以现实的历史进程为依据，重新规定社会主义，拓广其内涵，使之成为一种富有活力的人类活动方式。总之，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华民族通过改革自身的活动方式，以适应新的世界历史进程，使其所展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世界历史的努力。

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哪些？对此，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代表指出，这些基本经验应当包括：第一，能否把经济搞上去，这是对执政党的最大考验。经济搞不上去，执政党便面临危险。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兜圈子，坐而论道，而应当走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开放。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应当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有代表指出，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过程的重要保证。每一个社会都有特定的公平观。商品经济社会的平等观是平等竞争，以此来保证效率。中国现阶段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突出表现为破坏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只有把效率搞上去，方有可能作到公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公平观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左”的根源之一在于过多地从公平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用阶级感情、道德标准来压生产标准。但是，效率优先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应当忽视公平问题。如果不公平的问题过多，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则易诱发社会动荡。

（吴忠民）